

政协人记忆中的“邓大姐”

“邓大姐”在政协委员中间

杜亚利

人民政协有许多好故事，其中令笔者难忘的有六届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带头倡导参加政协小组讨论会的情景。这件往事虽然过去30多年，但至今历历在目——

“去年全国政协开会，选我当主席，但按年龄说，我该退休了，大家还是选我当了主席。由于年龄、身体和精力情况，我当这个主席，没尽到责任，内心经常感到不安。去年由于‘零件’出了点毛病，政协的小组会一次没去听。今年小组会力争去听几个，但小组有48个，也不能都去，在这里我向大家说明，我很抱歉，也很抱歉。谢谢大家！”

当邓颖超主席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开幕式结束前讲完上述这番话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掌声既表达了在座的1700多位政协委员对德高望重的邓大姐的崇高敬意，也表达了他们能够与政协主席共商国是的欣喜之情。

“邓大姐”的“日程表”

1984年5月12日下午，“邓大姐”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开幕式。

5月13日下午，她会见了出席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首届先进个人代表大会的代表，接着又到北京饭店参加了政协港澳界别的小组讨论会。

5月17日上午，她参加了政协台盟、台联界别的小组讨论会，晚间又会见了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

5月18日下午，她参加了无党派界别的小组讨论会，晚间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采访全国“两会”的港澳记者。

5月19日上午，她到空军招待所参加了文艺界界别的小组讨论会。

5月22日上午，她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新闻出版界别的赵超构和陆治委员，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

在短短一周多时间里，80岁高龄的“邓大姐”不辞辛劳，参加了这么多活动。看了这个“日程表”，谁能不为“邓大姐”这种广交朋友的工作作风而深表钦佩呢？

祖国总有一天要统一

那些天，“邓大姐”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讲得比较多的是祖国统一问题。她说，台湾回归祖国，是（20世纪）80年代以至90年代三大任务之一，这不仅要靠委员们的努力，而且要靠全国人民的努力。要看到统一祖国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思想上、工作上放手一点，既不要操之过急，也不要慢慢吞吞。

“邓大姐”说，现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全国各族同胞、海外华侨都看到我们是堂堂正正的。我相信，台湾总有一天是会回归祖国的。

刚从海外回归祖国定居的台胞吴永泰委员对“邓大姐”说：你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我听了很受教育，都流泪了。祖国对我们台湾同胞太关心了！邓大姐风趣地说：以后有你们笑的时候，那时候你们尽情地笑吧。

“邓大姐”和委员们心连心

5月18日上午，空军招待所八楼会议室不断发出阵阵欢声笑语。吴祖光委员说，“邓大姐”参加我们文艺界别小组讨论会，使我们想起当年周总理对文艺界的关怀，我们非常怀念周总理！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邓大姐”说：周恩来同志是周恩来同志，我不能代表他。

——掌声。

吴祖光委员说：你和周总理分不开！

——又是一阵掌声。

在小组会上，很多委员向“邓大姐”讲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邓大姐”说，大家可以把意见写成材料，交给中央统战部 and 政协去办。你们可以在会上提，也可以平时提。我们政协就管这个事，如果你们不放心，可以直接写信给我。

“邓大姐”说完这番话后，很多委员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无党派界别小组讨论会上，“邓大姐”关切地询问董竹君委员和李铁铮委员来了没有。有人回答他们二人请假了。邓大姐当即指示政协大会秘书处的同志代表她去看望董竹君委员和李铁铮委员。

看到了当年周总理的作风

笔者还记得，“邓大姐”无论是出席大会还是小组讨论会，都和委员们一样胸佩蓝色出席证；对于委员们的发言和意见，她总是认真倾听；大会简报也几乎每天都看。很多委员说，“邓大姐”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强调了改进统战工作作风的问题，她在会议期间就率先身体力行，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周总理的身影，看到了周总理的作风。我们要向“邓大姐”学习，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为实现（20世纪）80年代以至90年代三大任务而努力奋斗！



今年是邓颖超同志诞辰120周年。她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在全国政协办公厅，有很多同志都在她身边工作过，大家都喜欢

称呼她“邓大姐”。

工作之余，她与很多同志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在全国政协机关，很多人都能讲几件与“邓大姐”相关的故事……



▲在六届全国政协期间，邓颖超主席与机关工作人员交谈（右三为白建新）。

“邓大姐”的一句话影响我至深

白建新

记得那是在六届全国政协的一次常委会会议闭幕会上，邓颖超主席在讲话中说了一句“我们干什么就要吆喝什么”。不知怎的，这句话一直铭记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影响着我20多年的政协工作，甚至在我退休后的生活里还是念念不忘邓大姐的这句话。

“邓大姐”说的“我们干什么就要吆喝什么”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我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让我们每个人不论做什么工作，做什么事情，都要为你所做的工作去负责和去担当，干什么就要去说什么，干什么就要像什么。对于我们政协工作者来说，就是要在工作中学习和宣传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和理论知识，学习政协的历史传统和经验，在工作中去说政协的事，去谋政协的事，去干政协的事。

当时“邓大姐”的讲话是有针对性的，她主要是对我们这些政协工作者以及党内的委员提出工作要求和标准，让同志们在工作中做到学政协、懂政协、会说话办事，会做政协的事。

“邓大姐”在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时，不但是这么说，而且也是身体力行。比如，“邓大姐”到地方视察工作，首先从政协工作做起，通过对地方政协工作的调研，了解了一些实际情况，然后再与地方党委进行沟通，在沟通中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对政协工作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又如，我们今天仍在开展的“在京委员活动日”这一活动，就是落实“邓大姐”提出的“要多与委员联系，特别是多和党外委员交朋友，多了解他们的情况，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指示而举办的一项政治活动，一项统战工作。这项活动自1986年9月举办至今已30多年的时间，后来这一好的开展统战工作和政协工作的形式也在地方政协相继开展起来，并逐步成为人民政协工作中的一个品牌。

在我后来的多年工作中，虽然工作岗位几次发生变动，但在“邓大姐”那句“我们干什么就要吆喝什么”的那一种工作态度，那一种敬业精神的激励下，我都是认认真真地去做好每一项工作，做到了干一行就要爱一行，就要干好一行。在秘书局会议处工作的7年时间里，我用周总理的那句“统战工作无小事”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工作中努力学习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学习党的统战历史，学习人民政协发展的历史，学习政协的工作业务知识，认识到人民政协工作具有政治性和统战性的特点，在各项服务工作中要做到谨慎从事，注意共产党形象的影响。在具体工作中认真组织好每一次会议和活动，认真做好每一次会议和活动的纪律、认真写好每一次会议和活动的纪要，确保在各项会议和活动的服务工作中不出现漏洞，同时，在各项具体的组织工作中，努力为会议和活动的召开积极创造良好的宽松氛围，民主协商的氛围，让那些参加会议和活动的民主党派人士感到服务的周到。在7年的工作中，在各级领

导身上我也学到了一些好的思想、好的作风、好的处理工作中问题的方法。

在后来的22年的工作时间内，我参与了两件全国政协机关基本建设中的开拓性工作，一件是机关信息化工作；第二件是机关保密工作，前者我干就是18年，后者我干了4年多。

这两项工作对于我来讲都是不熟悉的业务，都是没有干过的工作，尤其是信息化工作专业性很强，可以说我就是个门外汉，一切都要从零做起。保密工作用今天工作标准看，也是一项业务性较强的工作，现在的一些国家重点大学专门设置了保密专业学科，每年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所需要的保密专业人才。所以对我来讲，要想做好两项工作，首先从思想观念上要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第二，就是要学习，学习有关的业务知识，努力成为既懂业务知识，又会管理的合格工作者，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干什么工作就能吆喝好什么工作，就能做好什么工作。机关的信息化建设经过我与同志们的多年努力和奋斗，由最初的机关仅有几个工作人员、几台计算机，发展到后来的一个有20人编制的信息化工作机构，机关工作人员使用上了互联网和工作内网，政协会议和常委会的会议会务管理实现了电子化和视频会议信息指挥系统，十三届政协又利用网络开展政协的协商议政工作。

2009年，机关的保密工作在中央保密委办公室和机关党组的重视下，设置了工作机构，配备了专职人员，使保密工作走上了正轨。我于2010年5月担任机关保密委副主任，开始做机关保密工作。按照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用几年时间抓好保密基础性建设的目标，经过4年的努力，机关保密工作从人员保密观念、从制度建设和管理、从抓好保密队伍和全员培训、从技术手段的投入和技术保障的服务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初步确立了保密工作在机关基础建设工作中的地位，实现了当初我给自己设定的工作目标。

几十年来的工作中，“邓大姐”的那句话一直影响、激励和鞭策着我，让我用这种工作态度、用这种工作精神、用这种工作标准去要求自己，努力克服和战胜工作中的种种困难，用心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应该讲，我的这两项工作都没有辜负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完成了组织上交给自己的工作任务，并得到了机关领导和各部门同志们的认同和好评。今天我虽然已经过上了退休生活，但“邓大姐”所讲的那种做事态度，那种做事精神依然影响着我的退休生活，依然是我遵循的做事态度。

邓颖超深情回忆与马骏一家的患难之交

贺兴中

邓颖超曾经在政协会上，回忆起她当年和周恩来、马骏等组织觉悟社的故事、聆听李大钊讲话的情景。我当时在现场采访，很多细节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1986年3月28日下午4时许，邓颖超主席来到京丰宾馆二楼的一个会议厅会见少数民族界别的委员。其后，她与马德钟委员叙旧。马德钟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的父亲是马骏烈士。马骏当年和周恩来、邓颖超等在天津组织觉悟社，一起参加五四运动。

邓颖超深情回忆道：“1919年9月21日，觉悟社成立的第五天，社员邀请李大钊来社座谈。李大钊先生坐在门口的一张靠背椅上。穿着蓝长衫、黑黑马褂的李大钊先生，和我们十几个人在小房子里，像家人一样和睦地叙谈。我们都站着倾听他讲话，他和蔼可亲、虚怀若谷，热诚勉励年轻人。”

邓颖超回忆自己那时才16岁，她向李大钊介绍了觉悟社成立的背景和旨趣，表示要向北京的前辈学习。李大钊先生说：“觉悟社是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的先行。”他勉励社员要注意研究世界革命新思潮，阅读《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的进步文章，探索革命真理，为改造中国而奋斗。邓颖超还回忆了马骏同志当年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1928年壮烈牺牲的情景。



▲周恩来与邓颖超：永恒的战友之情、伴侣之爱。

马德钟回忆说：“父亲牺牲后，北平不能待了，母亲带着哥哥、妹妹和我回到老家黑龙江省宁安县。”马德钟说，抗战胜利后，他跟随一位老师参加了革命工作。几十年来，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关心他们。1958年2月的一天，他和母亲路过北京时，接到周总理通知，请他们第二天中午到家里来。第二天中午他们按时到达，当时周总理还没开完会，邓颖超同志热情地招待了他们。后来，马德钟到宁夏一个艰苦的县里工作，邓大姐写信勉励他经受锻炼，紧密联系群众。马德钟回忆着、比画着、述说着，他虽已满头白发，年近古稀，却犹如孩童一般倾吐对于长辈至亲的炙热情怀，坦诚而真挚。

他深情回忆，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那举国哀痛的日子，马德钟陪同母亲从银川赶来北京，火车到呼和浩特站停车时，有人敲他们的包厢门。一位同志送给他们母子两大包烧鸡和面包，告知他们，这是邓颖超同志关照送来的，嘱咐他们到达北京站，有人来接。

马骏烈士和马德钟一家人与周恩来、邓颖超跨越60多年的患难之交，感人至深，铸刻史册。（本文作者均为全国政协机关退休干部，稿件由全国政协机关老干部局提供。）



▲1984年5月13日，邓颖超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港澳界别小组讨论会。